

願做「基督第二」的心路歷程

年屆九十感言

房志榮¹

本文作者是華文神學界中，第一位取得聖經學博士，並見證了梵二前後，先後曾以拉丁文、英文教書的華人學者。這對輔神「以中文做神學」的宗旨目標，甚具實質的貢獻與意義。本文的刊登，適逢輔神來台服務五十週年，及房神父九十大壽，不僅藉此為耶穌會中華省及聖博敏神學院留下歷史資料，也藉此祝願房神父生日快樂！

筆者 2016 年 3 月 18 日寫了一篇金魯賢主教回憶錄《絕處逢生》的讀後感（見本文附錄，542~543 頁）。書中金主教說自己是一個平凡人，卻過了一個不平凡的生活。這句話說得十分貼切，金主教一生的大起大落，令人驚心動魄，半個多世紀之久，經過多番驚濤駭浪，還能堅持信仰，忠於聖召，最後終於回到故鄉上海，當了主教，建立佘山修院，培養了許多神職人員，恢復了數以百計的教堂等，都是些不平凡的建樹和貢獻。反過來，筆者的一生平淡無奇，也許更好說，一帆風順，回顧一下，都是天主上智的安排，不知不覺步入目前的 90 大壽，全來自上主

¹ 本文作者：房志榮神父，羅馬宗座聖經學院聖經學博士，曾任耶穌會中華省會長、神學院院長，任教多年、作品廣泛。

的慈愛眷顧！

今天(2016/3/28)上午，在神學院入口處小聖堂朝拜聖體時，忽得一靈感：何不把天主賞賜的這近百年歲月，做個交代，表示對上主的感恩圖報：「上主賜我鴻恩，我將何以為報？我要舉起救恩的杯，呼號上主的名！」近百歲的年月不算短，不必繁瑣敘述，嘮叨說教，但值得擇要回憶一些往事，指出一生的主要階段，把可以一提的生命履歷，簡明地嵌入時空框架，使讀者和自己都能一目了然。不是為炫耀個人的一生遭遇，自我欣賞，自滿自足；而是為凸顯造物主和救世主的作為，是祂在我身上完成了奇妙化工——由自然生命，到超性生命；由世俗生活，教我度奉獻生活。總之，是上主把我從一個教外家庭，帶入祂的國度，擁有一個嶄新的生命，度一個全新的生活。

筆者 1926 年 11 月 23 日生於安徽省貴池縣，離國父孫中山先生於 1911 年在武漢所結束的革命相距 15 年。我 7/8 歲左右上國民小學讀書，老師、課本都是政府免費提供的，很感謝當時執政的中國國民黨。記得有一年，故鄉發生水災，老百姓可以領到白米，母親就教我去領過，覺得政府照顧人民，這是我小時候的一點生活體驗。10 歲左右，由貴池縣城北門、外祖母家後門，遠遠看到天主教聖堂，特別是堂頂的十字架和避雷針，安置在屋頂的前後兩端（我自己的家是在貴池縣南門的一條小街：吉兒巷）。一天下午，我和幾個小朋友走進聖堂，看見祭台上的花燭，聽到信友的歌聲和神父的詠唱，覺得很有趣，不久就跟母親一同到天主堂學教理。1937 年 4 月，母子二人，與其他十數位慕

道者，一同受洗；女的聖名都叫瑪利亞，男的都叫馬爾谷。從此，我就是房馬爾谷（Mark Fang）了。

貴池天主堂設有安徽省小修院，我看見修生們踢皮球、吹笛子，很想跟他們玩；有人對我說，你沒有領洗，怎麼能跟他們玩呢？有一天，教廷宗座代表蔡寧總主教在修院操場上舉行彌撒，修生唱著「可愛的，好耶穌，我求你，到心來；賞賜我，大福樂，我感恩，又還愛！」歌聲和歌詞都非常吸引我，覺得如果能和他們一起唱，那將多開心呀！當年7月，我就進入了備修院，接著讀小學課程，開始學拉丁文。想不到這西方文字之母的拉丁文，後來竟成了我求學的主要工具，無論是哲學、神學或聖經學，都是用拉丁文讀的，我倒也愛不釋手，連博士論文都是用拉丁文撰寫，全部由個人執筆，指導老師從未插手。

在備修院讀完小學，再於小修院讀完中學；1945年暑假後，我就被長上派到宣城大修院讀哲學，兩年的期末考都得到高分；1947年被安慶總主教梅耿光（Federico Melendro, SJ）送到羅馬傳信大學就讀。那是八年抗日戰爭（1937-45）後第一批送到羅馬的中國修生，共22人，來自中國各省，主要是華北地區。安徽省去了三人：蕪湖教區的陳其儀（後來放棄修道生活，到比利時魯文大學攻讀，成為有名的經濟學家）、安慶教區的蘇立言（後改名蘇藝）和房志榮。羅馬傳信大學是一座為世界各傳教區的修生所建立的大學，深深影響我國現代教會的兩大功臣：于斌樞機主教和羅光總主教；他們在此受培育，並在考得不同學位後，留校執教多年。我到傳大讀哲學時，于斌主教已於1946年被任命為南

京總主教；羅光蒙席則留在羅馬執教，我上過他的中國哲學課。

我在傳大讀完一年哲學、三年神學（1947~51）；快要晉鐸了，自己卻感不夠成熟，便告別傳大，由羅馬乘火車，路過法國，先到露德聖母顯獻的山洞，朝拜聖母，再去西班牙，加入我從小就認識的耶穌會，進入撒拉曼卡耶穌會肋翁會省的初學院。這是我一生所作的一項重大抉擇。兩年初學（1952~54）後，留在撒拉曼卡兩年，先用一年體認西班牙文化，如試讀 Cervantes 的名著 *Don Quijote de la Mancha*、由一位讀書修士 Jesus Bravo 帶領我參訪撒城的豐富人文古蹟等。第二年，當時的肋翁省省會長派我教授西國青年初學生拉丁文；由一名中國神父來到西班牙，教西班牙人拉丁文，一時傳為美談。其中一位（Agapito Fraile）後來以傳教士身分來到台灣，在聖博敏神學院又當過我的學生。1956/57 年，我先在 Comillas（當時還在北部 Santander 海邊，多年後遷到首都馬德里）溫習一年神學；1958 年前往羅馬，學習幾種古今各國語言，作為攻讀聖經學的必要準備。

留歐的最後五年（1958~63）全用在學習各種語言及攻讀聖經上。好在從小打下的拉丁文基礎，為學習其他西方語言都很有助益。當時除拉丁文外，西、英、意、法，我都已學過，希臘文也在初學院有所涉獵，只有德語和希伯來文尚未問津。1958 年暑假，我去德國巴伐利亞的首都慕尼黑，在所謂的「辦學修女」修會（Schulschwestern）的中學，為她們舉行每日彌撒；她們為我提供吃住，還派一位熟習意大利文的修女教我德文。這是我首次接觸到德國文化，而巴伐利亞的天主教信仰真誠寬厚，

令我大為景仰。與修女們一同在 Weikersing 山莊度假時，一位慕尼黑貴婦也在那裡，遇到我一見如故，從那年起直至 1991 年她過世，她每月與我通訊，提供書籍、照相機、投影機，及我所需要的一切，只須向她開口。

1958~61 三年在羅馬宗座聖經學院讀聖經，考取聖經學碩士後，獲西德專為學術研究的宏博獎學金（Alexander von Humboldt Stipendiat）一年，開始在慕尼黑大學寫博士論文，然後再申請一年，把論文寫完。1963 年 6 月，我回到羅馬聖經學院應考，獲得了聖經學博士學位。前文提過，論文以拉丁文寫成，我的指導教授（慕尼黑大學舊約聖經教授 Vincenz Hamp）完全放手讓我寫作，從不干預。可見，求學、做研究，所需要的是自由和老師的支持和鼓勵，倒不一定需要老師提供資料或意見。同年 6 月底東歸，先在馬尼拉做第三年卒試；次年就在碧瑤中華耶穌會神學院，教舊約和希伯來文，開始了執教生涯至今。

這 50 年的教學生涯，最初三年（1964-66）在碧瑤。第一年還用拉丁文上課，教的人和學的人都感辛苦。1965 年梵二閉幕，可用其他語言教學，我開始用英文授課，請一位美國同學注意我的發音，每堂課後，他傳給我一張紙，記下一些該糾正的英語發音。1967 年夏，聖博敏神學院由菲島喬遷來台，附設於輔仁大學，第一年只有耶穌會修士讀神學，仍以英文上課。第二年（1968）開始收教區修士，後來收修女和平信徒來讀神學，從此就不得不用中文上課了。其實，這也是天主的計畫，祂要我們用華語來談天論地、研究天主聖三及主基督的奧蹟。實用

華語做神學至今，已近五十年，我們用這古老的語言和文字來談論天主、敘述救恩，反而感到中文的多采多姿，對古人留下的豐富遺產，越來越親切，越來越有趣。

1969年開始出版《神學論集》季刊，1972年編輯「輔大神學叢書」，兩者形成一種文庫，像是兩道天梯，藉以上升天庭、與主交談，與天朝神聖共融。季刊和叢書的每期每冊，我都一字一句看過、校對，深感天福下降，主恩浩蕩！駐台五十年的歲月（1967~2016），可分為三個階段（下詳）。今將每一階段所從事的服務略予回顧，以表達對上主的深切感恩，並為耶穌會中華省及聖博敏神學院提供一些歷史參考資料。

一、1967~77 的十一年歲月，全程在神學院服務

1967年3月，我由菲律賓的避暑勝地、碧瑤的中華省耶穌會的神學院出發，帶著大批書籍，由馬尼拉海港，登上西班牙籍的紀納綱輔理修士（Br. Marcelino Aguinagalde）為我找到的美國貨船 President Line，航向台灣。本想在台灣北部的基隆港登陸，但船到高雄就不續航了；我只好高雄港上岸，雇了一部大卡車把第一批神學院的書，運到輔大法學院（那時神學院建築尚未完工），暫時存放在地下室。其他的神學院人員相繼來台，而整座圖書館的書，由當時的美國籍理家 Fr. Clement，把書架釘牢作為書箱，再找美國貨船免費運到台灣。當年的耶穌會中華省第一位國籍省會長是朱勵德神父，我還記得他為神學院主持的第一台彌撒，是在教學大樓第三樓的大教室舉行的；當年聖誕夜

的彌撒，也是朱省會長在耶穌會宿舍大樓第三樓的大廳舉行，因為目前神學院的八角形的聖堂，那時尚未建完。

1967~77 在神學院的十一年工作，除了教授舊約聖經和希伯來文外，尚於 1969 年開始編輯《神學論集》季刊，又於 1972 年開始出版「輔大神學叢書」。神學研習會於 1971 年開辦，以後除非特殊原因無法舉辦外，每年舉辦一次，當初本來是為神父和修女開辦，不久後，向所有的人開放。研習會的演講和討論都登在《神學論集》裡。最初幾年，主要介紹西方神學狀況；1976 年後，因中國主教團強調教會本土化，遂以「建立地方教會」為中心主題。思高聖經合訂本是 1968 年聖誕節出版的，譯經功臣雷永明神父親自贈送我一本，從香港寄到台灣，我一直沿用至今。到了 1984 年，《聖經辭典》和《每日頌禱經本》都有了中文版，神學院的中文教學及神學研習會，在這些既有的基礎上，可以因應時代需要，提供學習與進修的機會和場所。

這十一年，除了神學院的工作外，也有些其他值得回顧的往事。即刻記起的一件大事，是 1974 年的耶穌會中華省，應總會長伯鐸雅魯貝神父的號召所召開的中華省省大會，大會的主要目標是選舉要去羅馬參與耶穌會第卅二屆大會（1974/1975）的各會省代表。當時我擔任聖博敏神學院會院院長，首先被選出，第二位是當時擔任第三年卒試院的神師、美國籍的翟光華神父（Fr. Charles McCarthy），及當時的省會長、瑞士籍的蒲敏道神父（Fr. Franz Burkhardt）。我們三人前去羅馬，代表中華省參與耶穌會第卅二屆大會，以決定總會長雅魯貝神父的去留。結果，大會一

致通過，支持雅魯貝神父繼續當任耶穌會總會長之職。爲了善盡中華省代表的責任，我深感有前去美洲一趟的必要，因爲自從我 1947 年離開大陸，留學歐洲多年以來，從未去過新世界美洲。當時美國的耶穌會士人數衆多，聽說有八千多，已超過一向稱霸的西班牙。因此我決定去羅馬以前，先赴美國，由舊金山，經聖路易，到波斯頓，從西岸到東岸，略微認識美國耶穌會及其會士。順路也參訪了日本東京耶穌會辦的上智大學。這趟美洲之旅，果然拓展了我的眼界，有助於參與第卅二屆大會的各方討論。由美洲，我搭飛機取道西班牙，順便拜訪幾處我所認識的耶穌會會院，而後轉機前赴羅馬，參與大會。

二、擔任耶穌會中華省省會長六年（1978-84）經驗談

當時，朱勵德神父是耶穌會中華省第一任國籍省會長，第二任是朱蒙泉神父，我被總會長委派爲第三任。其時，耶穌會中華省的工作範圍廣泛，除台灣和大陸外，在菲律賓尚有三所華文學校連同附帶的本堂，爲華人及其弟子服務；在越南，恢復了幾個世紀以前耶穌會有過的一些本堂和學校；在泰國的曼谷和清邁，也建立了新的本堂和學生中心。省會長每年都必須到這些地區巡視一遭，聽每一位會士的「訴心」。一如我在口述歷史《志在榮主》裡曾經說過的：「讓我很感動的是，許多比我年長、以前當過我的上司，像嘉義朴子的蒲敏道神父向我訴心。從前他當省會長，我向他訴心，現在他向我訴心，這是很感人的經驗」。有的會士盡忠職守，不願離開多年所從事的職務。例

如前不久逝世的劉照民神父，在彰化靜山的避靜院擔任理家多年，好像是生了根，不想離開。我把他從彰化調到竹東，一時有點不愉快，但很快就適應過來了。他又做得很好很久，直至自覺無能為力時，才退到神學院附設的頤福園，安老休養。

培育司鐸聖召，是教會和耶穌會一向重視的事工。因此台灣總修院院長出缺時，為回應台灣主教團的邀請，望耶穌會予以申援，我就指派饒志成神父去當大修院院長。原則上，院長任期二年，饒神父作了六年。後來因為修會人力吃緊，主教團才另覓人選。梵二《教會對非基督宗教態度宣言》文件，鼓勵我們從事宗教交談，我又指派馬天賜神父（Fr. Albert Poulet-Mathis）從事這項任務，他賣力與各方溝通聯絡，做得有聲有色，並於1994年創立「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」（TCRP）。在《你的耶穌，我的佛陀》一書中，年輕的佛教徒陳世賢先生記錄了馬神父在宗教交談方面的一些故事。那些年，中國大陸漸漸開放，全世界對中國均感興趣，很多人來台灣學中文，他們心不在台灣，人人都想去大陸。我就派華澄濤神父（Fr. Franco Belfiori）去香港，以香港為中心，從事對大陸的服務工作。1979年鄧小平開放以後，華神父接觸到大陸各處的耶穌會士，按照各人的需要給他們寄錢、送物資，做了很多好事，也受到羅馬耶穌會總部和教廷的重視。

1981年6月，耶穌會總會長雅魯貝神父巡訪菲律賓回羅馬時，抵達羅馬飛機場前不久中風，不克視事，一位美國耶穌會神父（Fr. O'Keef）代行總長職。他於1983年召開耶穌會第卅三

屆大會，以選舉新的總會長，我以省會長身分參與。選舉前，有四天準備，每天早晨彌撒、祈禱，晚上明供聖體，不公開發言或大聲說話，卻可私下諮詢或到個人房間訪問。祈禱和訪問外，不做任何宣傳，好讓聖神主導全部選舉。我曾到不久後當選總會長的柯文伯神父（Peter Hans Kolvenbach）房間，問他對中國瞭解多少，他說「我全然無所瞭解」。選舉結果很快就揭曉了，第一次投票，開票不到一半，柯文伯所得票數已引發大家的鼓掌。這一屆大會主要是為選總會長，但大會也通過了六道法令。開會時間前後共 54 天，中國籍耶穌會士除了筆者外，尚有朱勵德、朱蒙泉、張春申三位神父與會。而兩百多位來自世界各地的耶穌會士，大部分都是初次見面，但討論起問題來，不難達到共識，而起共鳴，因為大家都以會祖聖依納爵的靈修和他制訂的規章為依據，大家只想共同尋找天父的旨意而全力以赴。

卸任省會長後第二年（1985），我被邀請代替菲律賓耶穌會省的 Catalino Areyalo 神父，到阿根廷首都附近的聖彌額爾神哲學院參與一場神學會議。趁此良機，我拜訪了十個說西班牙語的國家：墨西哥、薩爾瓦多、哥斯大黎加、巴拿馬、哥倫比亞、厄瓜多爾、秘魯、智利、烏拉圭和阿根廷。這樣到每一個國家看看，增廣見識，結果發現各國的耶穌會會院，生活方式大同小異，都有圖書館、報紙和各種參考資料。聖彌額爾神學院圖書館資料豐富，我在此用一個月時間寫完了演講稿，西班牙文原稿後來登在該神學院的學術季刊 *Stromata* 中；我自譯的中文稿〈本位化神學在亞洲及拉丁美洲〉登在《神學論集》67 期。

筆者六年省會長卸任後，由張春申神父接任；而原是神學院院長的他，提名我當學院院長。輔大神學院是羅馬教育聖部直轄的全世界 135 座神學院之一，院長人選須經省會長提名，由總會長呈送羅馬教廷教育聖部，聖部批准後正式委任。我擔任院長期間，做了兩個重要決定：一是獎學金不再到國外募款，一如谷寒松神父多年來所努力籌措的，而是在國內外的華人中徵募，後來建立了「徐光啓獎助學金」，效果良好。另一個決定是學雜費問題，前任院長只收大學學費的三分之二，我決定按照大學文學院（非理工學院）標準收取全額學費，以正視聽，讓人知道神學教育不是次等教育。我深覺是天主聖神在領導這一切，而神學院師生的開放態度和共融精神，也是重要因素。氣氛好，有助於人的成熟長大，拓展師生員工的胸襟。

那些年裡，輔仁大學宗教研究所和宗教系的成立是另一件大事，這主要得歸功當時的輔大校長羅光總主教。最初，羅光想成立宗教學院，在 1988 年宗教研究所成立之前，他推動了好幾年；當時的教務主任張照營先生、後來的李震蒙席、朱秉欣神父等人，也都下了不少功夫，但教育部一直不予批准。多年的努力沒有成果，只好從規模較小的研究所著手，就像輔大哲學系當初也是由研究所開始的一樣。這次成功了，得到了教育部的核准。羅光校長本想把宗教研究所歸屬於教區神職單位的文學院，但因經濟負擔問題，終於被財政較寬裕的耶穌會單位的法管學院承擔下來。

1988 年成立宗教研究所時，我是神學院院長，同屬耶穌會

單位，因此就指派我兼任宗教研究所所長。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座屬於大學部的宗教研究機構；以後其他宗教，特別是佛教，逐一跟進，成立了許多宗教研究所。四年後（1992），教育部核准成立屬大學部的宗教系，每年每班可招收 40~50 學生，且成立學會，以維持系所開支。耶穌會習於按照需要調配人才，那時候，陸達誠神父是政治大學哲學系專任教授，張春申省會長派他來輔仁大學擔任宗教系系主任，放棄政大教職此一重要工作。再兩年後（1994），因應當時大學系所合一的趨勢，陸神父兼任宗教學系碩士與學士班主任；我已年過 65 歲，可以退休了。

三、1985~2016 三十多年多元化神學的生活

（一）文字事工

羅光總主教一直認為，天主教應該利用大眾傳播媒體，向外發聲。他任台北總主教時，很想辦一份日報，但因經費不足難以實現。1989 年他決定創辦《益世評論》雙週刊，請我當社長，交代我必須自己寫文章，也請別人寫。5 月 1 日，創刊號出爐了，羅校長是發行人，李震蒙席為召集人，當時任職於中央報社的林立樹教授當總編輯。當年聖誕節，我介紹了一份德文雜誌裡的聖嬰故事。一座幼兒園打算排演耶穌誕生馬槽劇，要用真實的嬰兒裝扮小耶穌。當地的許多母親，無人願意提供自己的嬰兒，終於有一名土耳其外勞答應提供。許多人覺得，讓一個阿拉伯人的嬰兒扮小耶穌，有點不可思議。但是當那土耳其媽媽抱著她的嬰兒出現時，孩子張著一雙棕色大眼睛，滿

面笑容，左盼右望，讓人好像看到了真實的小耶穌一樣，大家很自然地唱起 *Adeste fideles*、*Noel Noel*、「歡欣、歡欣！」等中西文聖誕歌曲來。

《益世評論》能辦成功，有賴總編輯林立樹先生，他曾在中央通訊社服務，很有經驗。他在輔大歷史學系當專任老師，同時擔任雙週刊總編輯 12 年；後來由在文學院教哲學的李匡郎老師接手，繼續辦了三年，共 15 年（1989-2004）。

我把自己寫過的文章，根據信仰、兩岸、學校、社會等，分類整理，編成五本書，命名《書生論政》，由輔大出版社印行出版。羅光校長很有心，我也盡力而為，但學校教職員沒有多大興趣，2004 年 8 月出完第 352 期就結束了，為同年 11 月出版的《輔大記事報》雙月刊所取代。當時，羅光以校長身分當發行人，自己也能寫，但《益世評論》已維持不下去，就像中央日報一樣，雖資源那麼雄厚，也得停刊了。大眾傳播很重要，但很難把握，只得認命，而另找途徑了。

（二）行政事工

1997 年夏，我在羅馬參與留學歐洲的大陸修士、修女、教友的活動時，接到劉家正省會長的電話，要我下一年開始，擔任輔大法管學院之耶穌會會院院長。法管耶穌會會院離神學院很近，而我的工作主要仍在神學院，因此每天在兩會院間來回走三趟，以參與彌撒、公禱，和用餐或開會。法管學院新大樓有十層，是輔大最高的大樓，第十樓是耶穌會會院；但為會院

院長設置的大套房，我從未用過，而讓給過客使用。1998年8月初，馬爾蒂尼樞機（Carlo Maria Martini, SJ）來台灣給耶穌會士講授每年的年退省，就住在這房間裡；後來單樞機也曾住過。

其時，法管學院經濟系的林濤教授，跟我學天主教要理。期間一年多，每週一晚上一個半小時；聽完重要道理後，我們決定，不必馬上領洗，而等全家都學教理，一同受洗，加入天主教大家庭。他的夫人在基隆，跟聖母聖心愛子會的麥神父（Fr. Mario Bonfaini, CMF）聽完道理後，全家於2004年傳教節（12月24日），在基隆耶穌聖心聖堂領了洗，我與法管學院的神父、職員，及擔任代父的汪文麟和張伯鐸兩位神父，都一同前去參與典禮。

第一屆全國聖經研習共融營，於2004年4月23~25日在高雄澄清湖中華電訊高雄訓練所舉行，我受邀演講，講題是「新約諸書寫成先後與其內容的關係」，我把主題分為三個子題：1. 新約廿七部書編印的次序，如四福音是從猶太（瑪竇），到羅馬（馬可），到地極（路加），最後回歸父家（若望）；2. 新約諸書寫成的次序：保祿書信最早，然後是馬可、路加、瑪竇、若望等；3. 由新約看聖母瑪利亞：她的信德、服從、追隨耶穌至十字架旁，受託為世人之母。

2004年，我還擔任法管耶穌會會院院長時，有人建議給輔大一級主管（校長、副校長、院長等）介紹天主教。有些人不贊成，認為這有點勉強。其實提議人所主張的，只是邀請，給一級主管（後來加上教官）一個機會，認識主辦輔仁大學的天主教會的來龍去脈。時間原訂中午12:10，後來與我討論時，我覺得這時段

大家都累了，效果不好；最後大家決定放在每週四上午 8:10 一個小時。爲使內容有連貫性，由我一人主講；我所講的，都從每日生活面著眼，把生活與天主啓示連結起來，有很多可講的。

輔大一級主管認識天主教講習，是一項邀請，每學期開始，黎建球校長寫信邀請一級主管來參與。校長每次都來，帶動整個團隊，郭維夏、林思伶、江漢聲三位副校長也都來參與。前文說有很多可講的，舉個例子來說：聖依納爵建立耶穌會有許多革新措施，如不必一同唱日課經，以利在外福傳；沒有固定會衣，而如一般司鐸的穿著，爲能容易接觸各種人；不定期召開大會，而按照需要召開，以免耽誤重要的事，因爲來開會的人多半身負重責，不得輕易放下。耶穌會單位如此，聖言會單位、聖神修女會，及教區神職，各有他們姿態萬千的故事可講。

（三）聖經事工

1967 年，我來到台灣，因是教授聖經的，就被台灣聖經公會請去當該會的董事。全世界只有兩個國家的聖經公會有天主教人士參與，並擔任董事，就是台灣和泰國。台灣聖經公會的總幹事，從賴炳炯牧師開始，到蔡仁理、賴俊明，直到目前的總幹事鄭正入牧師，我們都彼此相識，保持聯絡。聖經公會已有二百多年歷史。第一個聖經公會，1804 年成立於倫敦，1964 年世界聯合聖經公會（United Bible Society）成立，其目標是推廣聖經，希望人人都有一本聖經在手。目前，聖經公會遍及世界各國。香港和新加坡因爲是英國殖民地，成立的最早，至今依然

興旺有力；接著是韓國和日本；而國民黨執政時期的台灣，成立了「中華民國聖經公會」，2003年才正名為「台灣聖經公會」。我一直任其董事，參與召開的各種會議，都在台北市仁愛路。

合譯華語聖經，是台灣聖經公會的一大特色和努力的目標；1968年元月，曾由公教與新教雙方代表予以討論。同年，羅馬教廷與世界聯合聖經公會共同發表〈各教派合作翻譯聖經的一些指導原則〉文件。翌年，聖經公會駐台主任賴炳炯牧師組成「漢文聖經統一譯本籌備委員會」，予以討論。1970年夏，在台中東海大學召開一個月的「聯合聖經公會東北亞區譯經研習會」，來自中國、日本、韓國、新加坡、香港、馬來西亞等華文地區的學者，由著名的聖經翻譯專家耐達博士（Dr. Eugene Nida）夫婦領導開會討論。當時台灣主教團團長郭若石總主教委派劉獻堂、陳維統、韓承良，和筆者四位神父參與。

1971年始，許牧世牧師把《現代英文聖經》（*Today English Bible*）新約譯成中文，譯完後寄給8位中國聖經學者審閱，修訂後於1976年出版《新約聖經現代中文譯本——天主教版》。舊約部分，因為有七部書（即多俾亞、友弟德、瑪加伯上、瑪加伯下、智慧篇、德訓篇、巴路客）基督教稱之為偽經，無法出版公教與新教共同舊約。以後，在周聯華和賂維仁兩位牧師的努力下，於1979年出版了現代中文譯本全部聖經，在台北市雙連教會公開發表慶祝。中文全部聖經的印行，可追溯到1919年和合本聖經（Union version）的首次出版；1979年，出版了現代中文譯本，前後相距60年。天主教完整聖經譯本，是思高聖經，1968年聖誕節出版（牧靈聖

經則於 1998 年出版)。公教聖經與新教聖經，二者因來路不同、譯者不同，人名和地名常有些不同，這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。

(四) 兩神聯誼

提到公教、新教，即刻想起台神與輔神的聯誼活動經驗。輔神 1967 年遷台後，隔年（1968）就與陽明山台灣神學院從事交流、聯誼活動，且採取輪流主辦方式：一年由台神於陽明山主辦，次年由輔神在新莊主辦。我們用一個下午時間，或師生共融，或學生打球、老師座談等，最後以共享晚餐結束。1987 年的那一次，除了台神和輔神外，南神趁他們到台北募款的機會，也前來參加。三座神學院師生，在輔神的大禮堂彼此分享心得和感想，真是弟兄相處，其樂融融。有些照片與心得的記錄，登在《神學論集》73 期裡，讀者可以參考研究。

(五) 重回老家

當完六年省會長，1984 年 2 月卸任，3 月即赴大陸，一直待到 5 月。那是我 1947 年出國去羅馬讀書 37 年後，第一次回家探親，印象深刻。那些年代，在大陸乘飛機比坐火車便宜，但我選擇了火車，從香港九龍，經廣東、江西、江蘇，直到上海，兩天一夜，略微見識沿途的中華大地。其時，大陸政權對台灣旅客特別優待，給我提供的鋪位和飲食都很不錯，他們是以「上賓」的禮遇接待我。

由上海乘坐長江大貨輪，經蕪湖到故鄉貴池，這裡有碼頭可以停靠。船抵貴池時，已是半夜，家人都到碼頭來接，真是

親人相見，感慨萬千。37年了，哥哥的孩子有的已結婚生子，見到許多晚輩，心中十分高興。回到家裡，睡在自己出生的房間床鋪上，為那時已 58 歲的我，有多少回憶湧上心頭！那幾天，到處尋幽憶往，尤其是我最初認識天主教的地方——北門、外祖母的家。從南門我家到北門外祖母家，有一條牌坊街，是為清朝孝子孝女所建立的紀念牌坊，都是雕刻精美的藝術品，可惜全被文化大革命破壞了。所幸，外祖母老家還在。1984 年後，五年沒有回家；以後 1989~93 五年，每年回去，發現外祖母家已被拆了。

1993 年，我回家四次。那年 8 月 29 日至 9 月 12 日，我與編著安徽省傳教史料的楊堤，各地雲遊，參訪聖堂，會晤往日未入大修院的小修院老同學。楊堤人脈廣、人緣好，使我們到處有人接待。他也熟習地理環境，把行程安排地恰當多元。最後兩天，我在合肥市大堂舉行彌撒，這可能是次年（1994）官方拒絕給我入大陸簽證的原因。等了一年，1995 年，我在香港辦好入境證，飛到南京，卻被拒入境，要我搭下班飛機回香港，已預購的回程機票作廢，須再買機票回港。此後六年都沒有回家，直至 2001 年 9 月，才由東吳大學為我辦了台胞證和入大陸簽證，與該校一批學者，去北京參加「宏博獎學金得獎人大會」。

1984 年首次回家的印象是，老家附近破破爛爛，沒有任何建設，甚至還不如從前——原有的城門、城牆都撤毀了，不留痕跡。我小時多次走過的城牆，及進出必須穿過的四座城門——東南西北四個方向，為我閱讀聖經故事很有幫助。例如當《民

長記》描述三松撤下一扇城門背著走時，我一看就懂，那需要多大力氣！可惜，現在這些古蹟，現在都不見了。爲了現代的物資運輸，拓寬馬路，有其必要，只是沒有整體規劃，把古老的寶貴建築全都摧毀了，十分可惜！直到 2004 年我再度回家，才看到一些古蹟修復起來，人民好似已有所覺悟了。

（六）海外培育工作

波昂、羅馬暑期班：1968 年夏，波蘭籍的聖言會馬雷凱神父 (Fr. Roman Malek, SVD) 籌劃爲在歐洲各國留學的中國修士、修女 34 人，在西德波昂辦暑期班，請我去帶領避靜；避靜前後各有兩天從事聖經講習。爲避靜的五天，我每天設定一個主題：「主，教我認識您」；「主，助我認識您」；「有一嬰孩誕生了」；「耶穌基督，我們欽崇祢、讚美祢」；「這是上主所安排的一天，我們要歡欣鼓舞」。在分享中，我請他們注意以下三點：1. 學習每個人所在國家的優點，不要被近代西方表面的俗化現象所惑；2. 徹底學好各人所在國的語言，同時不忘每天讀中文、寫中文；3. 在團體生活中，常把別人的所說所爲往好處著想。

兩星期的研習，上午有聖經課，下午分組討論、報告，晚上自由活動。我用 18 個小時介紹舊約 46 卷書，10 個小時講新約 27 卷，講完，意猶未盡：從《創世紀》的造天造地，到《默示錄》的新天新地，使大家體會出來，先有生活，後有文字；先有天人交往，後有盟約的建立。因此，聖經必須引人達到天人交往，才算達成了寫作的目標。次年夏天，同樣的活動在羅

馬進行，也請我去幫忙，並陪學員們參訪羅馬。傑利總主教 (Mgr. Celi) 8 月 4 日大熱天，穿著黑長袍帶領我們參觀梵蒂岡城國，讓我們進入一般旅客不容許去的角落，並跟每一位要求他的人合照，充分顯示出他對中國人的熱愛和重視。

此外，我也陪伴留學歐洲的修士修女參訪法國各地。1998 年夏，巴黎外方傳教會的沙百里神父 (Jean Charbonnier) 請我陪他，帶領留歐的中國修士修女，參訪里修、泰澤、里昂、露德等地，共二千多里的行程。我們在泰澤過了一夜，該團體唯一的中國修士何錦棠安排好住宿後，領我們到修士們的餐廳用茶點。七點鐘，該團體創立人羅哲弟兄 (Br. Roger) 來見我們，與每人「碰面」(須按字面懂) 談話。他對這批中華兒女，似乎情有獨鍾，臨時決定不回客廳，而就在修士們的餐廳繼續談話，同時進餐。席間，他獨自上樓取來四盒新鮮火腿片，請大家享用，他自己只吃兩片烤麵包，泡在一小碗清湯裡當晚餐。誦完晚禱後，彼此碰面互道晚安。次日，他提前打開販物庫房，讓我們購買聖物，並贈送每人一張他與教宗的合照，及泰澤祈禱的 CD。我們登上遊覽車趕回巴黎時，他還請人駕車追上，與我們每人「碰面」，給我們送行。18 個小時內，他四次與我們「碰面」，83 歲的老人這麼關心中國，愛中國人，令我們又驚又喜，無限感激。參與中國修士、修女的活動後，我到巴黎附近的 Clamart 靈修中心，作 8 天的每年避靜，作完後，沙百里神父駕車送我到機場搭機飛回台灣。

三年後 (2002)，我有一東歐之旅的機會。馬雷凱神父為留

學歐洲各國的大陸修士修女，舉辦參訪波蘭全國活動，邀請我利用德文資料介紹各地，從北部的但澤（Danzig），到中部的華沙（Warsaw），到南部的克拉克（Krakow），三個星期之久，每處受到當地教會的殷勤款待，心情愉快，收穫豐富。2003 年，我去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附近耶穌會避靜院，參加耶穌會大公主義工作人員會議。同年，韓德力神父（Fr. Jerome Heyndrickx）請我到比利時與大陸學者開會，討論中國現況。從 1998 到 2012 這 15 年，每年 6/7 月，我去菲律賓馬尼拉聖功會修女辦的基督書院，給不同修會的中國修女講聖經。

（七）聖地之旅

自 1961 年 6 月獲羅馬宗座聖經學院聖經學碩士後，我第一次去聖地朝聖。我們同學七人（比利時、荷蘭、美國、印度、中國各一人，意大利二人），因課程要求，已從 3 月始展讀聖地的歷史、地理。該年 6 月，我與一位比利時教區神父先乘火車到意大利東岸的 Brindisi 碼頭，由此坐船到埃及，停留二星期，參觀開羅、路客素爾、亞數爾大水壩等地。然後由亞歷山大里亞碼頭出發，續航黎巴嫩首都貝魯特，參觀敘利亞、約旦，再從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乘車穿過約旦王國首都阿曼，下午過約旦河，經猶大曠野抵達聖城耶路撒冷，投宿於耶穌會宗座聖經學院的耶路撒冷分部。首次身歷耶京的大好景色，不時感受到有如電擊般的震撼。

在耶京耶穌會聖經學院分部，平日我們照常讀書研究，週

末則由比籍或美籍耶穌會同學輪流駕車，帶我們到不同地點做一天、二天，或最多三天的考古活動。我們每人負責一個主題，事前加以研究，然後一同出訪，以加深對聖地的認識和體驗。記得初次見到「萬國聖殿」（耶穌山園祈禱大堂）的一刻，心中悸動難以言宣。以後每次踏上耶穌所路過的地點，心中仍不免蕩漾起深深的幽思、切切的仰慕、沉沉的祈禱。這一次，我們到了聖地最南部的艾拉特（以色列紅海港口），也去了大約是古安色尼隱修士寄居的死海邊古木蘭，進入第四洞，即發現依撒意亞卷軸的洞穴。北部加里肋亞的大博爾山，保存了各時代的石器、鐵器；附近的麥基多山，保有許多古文化的遺跡等。為節省費用，我們不住旅館，而在死海、紅海邊過夜，也別有一番風味。

最後，我一人參觀了雅典、格林多等地，然後乘船到拿坡里，由此搭火車回羅馬。在參觀各地時，我拍了八百多幅彩色幻燈片。從這些照片中，我選了一百多幅，每幅引用一段福音的敘述為主題，然後說明照片所指的聖經地點，及其與福音和耶穌的關連。我用德文寫，一位同學好友（P. Norbert Lohfink, SJ）幫我修改，最後找到慕尼黑慈佑會出版社予以出版，書名《載祂之地》（*Erde, die Ihn trug*），這是我出版的第一本書，以我國名句「天覆地載」為根據，深思太陽系許多星球中，唯獨地球有這福份，承載了造天地、造繁星的祂——天主子、我們的主、耶穌基督！我們做基督徒，當天主子民，何其幸運、何其有福！

1981年，耶路撒冷宗座聖經學院分部召開國際聖經研討會，主題是「聖經與本地化」，會期一星期，參與者都是耶穌會

士。我受邀參加，發表論文，主題是「聖經與中國經典中的更圓滿意義」。當時我尚任省會長，較忙碌，只得請人譯為中文，登在《神學論集》51 期裡。

1961 年第一次去聖地，耶路撒冷尚由約旦和以色列分治，我寄住的聖經學院在耶城西部以色列治區；一次由約旦過來，就不能直接回任何阿拉伯國家了。1967 年六日戰爭後，以色列把東西耶城合併為一，因此 1981 年再次來聖地，可在耶京城東西自由走動，發現夜晚燈光照射下的耶路撒冷，特別美麗。一晚，我與一位來參與研討會的拉丁美洲神父圍著耶城走了一圈，欣賞燈光照耀下的耶路撒冷城牆。當地出產的黃色石頭，在黃色燈光照耀下，顯得特別柔和，以色列政府的這一設施，給觀光客多大啓發，值得鼓掌。

1991 年，我陪三重市本堂張正發神父和七位教友去聖地朝聖。一個協助國外福傳的義大利教友組織 ANSMI (Associazione Nazionale per Soccorrere i Missionari Italiani) 支付來回機票，到聖地朝聖 21 天。那些年，我常到三重堂區幫忙老同學張神父，這次能與他及讀經小組一同親臨主耶穌踏過的聖地，樂不可支。我們直飛以色列，寄住湖邊七泉區 (Tabgha) 屬 ANSMI 財產的宿舍十天之久。莫神父 (Fr. Paul Molinari, SJ) 和安修女 (Sr. Ann) 當買辦，我們自己照顧飲食起居，他們二人也駕車帶領參觀各地。後十天我們移到耶路撒冷，由我帶領大家參訪耶路撒冷、白冷、死海、古木蘭、耶里哥等。這些地方我 20 年前都來過，帶領大家仔細參觀，深切體驗，不難。

1996年，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舉辦「聖經在近代中國」國際學術研討會。一位懂中文、愛中國文化的女士 Irene Eber 邀請歐美、大陸、台港 20 多位學者與會。大家都懂中文，卻以英文為大會共同語言。聖經與中國是大家很感興趣的課題，因此討論起來，常會欲罷不能。我發表的論文是「西拉之子《德訓篇》及《易經》中的『自然』，與人及與神的關係」。討論會中，基督教弟兄分享他們的大陸福傳經驗，都與聖經有關，尤其是如何用聖詠來祈禱，例如把《聖詠》廿三首「上主是我的牧者」貼合在今日的實況上等。談說對話，有說有笑，大家不知不覺地合唱起來，像是搬出了大家都很熟習的傳家之寶：《聖詠集》。

來自台灣長老會的張思聰牧師，自費讀希伯來大學研究所，也前來旁聽。一天，我邀請他和中山大學來參加研討會的蘇其康教授，由希伯來大學所在的橄欖山北端，沿著馬路往南，走到克德龍山谷（即當年耶穌多次走過的山谷，如被捕之夜，就是在橄欖山園祈禱後，經過這山谷被帶到大司祭庭院受審）。我們踏著耶穌的足印，默思祂前去受苦以完成救世大業的心情，稍能體驗祂的奉獻自我，及慷慨赴義為人犧牲的大無畏精神。思聰與夫人淑華定居耶京，帶領朝聖團，用中文為朝聖客講解。夫妻二人曾請我到他們家吃晚飯，以加納酒助興；三名台灣來的中國基督徒，在耶穌故鄉飲酒共融，是畢生難忘的寶貴經驗，感謝天主。

2005年，與聖家會五位修女及聖家善會的一些成員，赴聖地朝聖，在白冷聖誕大殿旁的聖若瑟堂，我發現幼女瑪利亞步出家門的納匝肋聖母立像，即天使給瑪利亞報喜後，聖母出門

訪親的聖母立像。這尊塑像製作精美：亭亭玉立的幼女，臉色黝黑，透露出健康與自信，向前伸開的右手表示隨時待命，左手緊靠胸房，表示保護、帶領著腹中胎兒，赤腳踏在石洞出口的第五石階上，走出納匝肋的家，兩隻眼睛朝前看，好像在尋求上主的旨意。有一次，在一場拍賣上，我看到這尊立像，開價不低，但仍然高興買下，供在已寄居 50 年的房間書櫃上，進出房間都可瞄立像一眼，求天主母童貞母聖瑪利亞領導我，跟她一道步上走向天國之路，會晤主耶穌。我們也拜訪了耶穌會宗座聖經學院的耶京分部，一位印度籍的輔理修士接待我們。那段時間，馬爾蒂尼樞機也在那裡：他退休後，一半時間在聖地，一半在羅馬附近。1999 年，他曾受邀來台灣，給耶穌會士帶領年避靜。當印度修士通知他，有神父和教友從台灣來訪，他立刻下樓，與我們寒暄，拍照留念。

1975 年，我首次應邀去馬來西亞開講習會，在金馬崙、吉隆坡和新加坡各地，每處講聖經一星期，週末則到各地參觀。其後多年，透過新加坡大學的黃玉清小姐，一直與他們保持聯繫；30 多年中，去過新馬作多次講習。2007 年 5 月，我受邀帶領他們去聖地朝聖。我們從以色列特拉維夫入境，在加里肋亞各處參觀，最後上耶路撒冷。12 天之久，踏著耶穌的腳印，選擇適當地點舉行感恩祭，晚上坐下分享，有許多體驗和感動。例如耶城丘陵下坡、紀念伯鐸否認主的雞鳴堂，是耶穌被捕後過夜的地方，由此下到革責瑪尼山園的石階路，一旁石壁上刻著耶穌被捕的浮雕，十分令人感動。

2008年6月14~28日，我帶領新加坡教友，尋訪聖保祿在小亞細亞的首次福傳路（約主曆45~49年）。我們一行27人，從保祿出生地塔爾索（Tarsus）開始了這趟朝聖。當地女導遊是一位穆斯林，用流利的英語解釋當地史實；至於教會史中的細節則由我予以補充，每日彌撒和晚上分享中，再加一些解釋和說明。保祿首次福傳地點，很多已成廢墟，只留下一些遺跡，如聖堂的畫，表達古人對主的崇敬。我們也參觀了安提約基（Antakya）山區的神伯鐸古老聖堂，是初期信友逃難之所，教宗保祿六世1963年宣布這聖堂及其附近地區為朝聖地，每年6月29日，伯鐸、保祿慶節，很多信友從世界各地來此隆重慶祝。

我們還去了保祿大約沒有到過的卡帕多細亞（Anatolia）地區，希臘教父巴西略和兩位額我略（南詳和尼散二地的主教）都曾在此隱修。他們及後代基督徒留下的山洞聖堂，有些壁畫還能辨識，如聖堂拱頂的「基督萬物主宰像」（Christus Pantocrator），左手握書，右手拇指、小指、無名指相連表達三位一體奧蹟，食指和中指向外意味耶穌二性一體、是真天主真人，由天父派遣來到世界，有聖神合作，作人類和宇宙的救主。

厄弗所是一座很重要的城市，保祿傳揚福音的十年間，在此寄居過兩年半，是他停留最長的城市；在到處奔波的歲月中，他路過此城，前後不只一次。《若望默示錄》提及七個教會，第一個就是厄弗所教會。聖母故居離厄弗所不遠，是一棟用方石修蓋的小屋，小屋的發現十分有趣。十九世紀的德國厄默里修女（Catherine Emmerch, 1774~1824）臥病在床十多年，她有過許多神

視，寫過一本有關聖母的書，書中對於厄弗所的聖母故居有詳細描述。五十年後，1880年代初，法國聖文生修會於厄弗所會院的一位神父，按照書中的描述，從事考古求證，而發現了這座小石屋，也許是宗徒若望在聖母瑪利亞的晚年，為領養他的繼母所建的一棟居室。

耶穌三年宣講天國，不出巴勒斯坦這塊土地，最遠只到過菲尼基的堤洛和漆冬。這是耶穌的謙虛，不願單獨做救世主，而只開個頭，甘心被人釘死於十字架，讓追隨者及門徒與他一同救世，一如祂曾說過的：「你們將來還要做比這更大的事」。保祿福傳十多年，走遍土耳其、希臘、羅馬帝國各地。我們觀察他如何宣揚耶穌、如何認同基督。沒有耶穌，就沒有保祿；沒有保祿，也不易深入認識耶穌，把耶穌的福音在我們生命中活出來。在聖地，我們踏著耶穌的腳印，體驗到祂一生的奧蹟。

四、華夏文化中的聖言種子

2008年初，耶穌會第卅五屆大會選出倪勝民神父（Fr. Adolfo Nicolás）為總會長；次日，他就去拜會教宗方濟各，向他請益。教宗提出三點：努力傳福音、從事文化交談、認真培育下一代。在從事交談上，教宗講宗教交談，也講文化交談，這在我國特別重要，因為國人宗教情懷薄弱，讓佛教趁虛而入。中國的傳統宗教是道教，但道教只是民間宗教，沒有經典，沒有崇拜儀式。至於儒家，有時也被稱為儒教，但儒學不是宗教。國人宗教情懷弱，文化意識強，因此在說宗教交談時，往往不知不覺

滑入文化交談。

儒家傳統已融入國人的生活，因此儒家也被稱為儒教，就像道家道教、佛家佛教一樣，三教九流的說法就是這樣形成的。儒家、道家、佛家指稱文化方面的投入和專業，儒教、道教、佛教則指宗教的依附和獻身。三家與三教糾纏在一起，「家」與「教」混亂不清，宗教與文化強佔同一地盤，都是因為缺乏唯一真神的認識和信奉。這一方面，中國文化需要猶太宗教和基督信仰的支援。儒家不是宗教，佛教無神，道教多神，都沒有唯一真神的信仰。猶太/基督信仰對人類的最大貢獻，就是給我們傳授了這個唯一真神的信仰。基督宗教更因耶穌啓示了三位一體的天主，而達到真理的高峰，從此，基督徒的生活，都以三一真理為依歸。

聖言的種子何解？2006年始，我在真理電台每週廣播一次「東西經典對著看」的節目。先寫好講稿，每篇約1200字，供十分鐘講出，然後到電台錄音，每次錄6篇，共一小時。第一次講什麼是東、什麼是西？第二次談何謂經典：東方經典指四書五經，西方經典指聖經。每次由中國經典著手，再與聖經對比。例如講《論語》第十三章：子路問孔子：「衛君待子而為政，子將奚先？」子曰：「必也正名乎！」子路說夫子好迂闊。孔子訓他說：「野哉，由也！」這場對話露出師生二人的本色，孔子接著講了一篇大道理：「名不正，則言不順；言不順，則事不成；事不成，則禮樂不興；禮樂不興，則刑罰不中；刑罰不中，則民無所措手足」。

保祿在《羅馬書》裡有類似《論語》的語句或說法，說：「凡呼叫上主名號的人，必然獲救……從未聽到他，怎能信他呢？沒有宣講者，又怎能聽到呢？沒有奉派遣，人又怎能去宣講呢？」這裡也是一連串前呼後應的詞句。這就是東西經典，雖然寫於千里之遙的兩個不同地區，來自東西不同文化，卻以類似的語法和串連的詞句，說出生命或信仰的大道理。孔子與保祿二人的說法十分相似而生動有力。這樣看來，中國文化中確實埋有聖言的種子，儒、釋、道所教所說，尤其是孔孟老莊，都有許多人生大道理，不過都還在種子狀態，等待天主的啓示來予以揭發、完成、聖化、神化，這就是主耶穌基督所達成的。作基督徒何其有幸，我們就是基督的化身！

啓示之光繼續照亮生命晚景。「上主，求祢保佑我，因為我只投靠祢」，這是我常誦的一句祈禱詞。年紀大了，更會把自己交給天主。我個性不多主動，許多事是應人邀請而做，只要我能力所及，不會拒絕，不愛說「不」，一旦答應，就盡力去做。我的責任感教我一件件地作：一件未作完，不做另一件。投靠天主就是信賴聖神；聖神的帶領遠遠超過人所想的，祂照亮生命晚景。

1998~2012 十五年間，我每年 6/7 月到聖功修女會的馬尼拉基督書院上課，從未中斷。2006 年始，也到中國大陸講學。除此以外，也給不同的人帶領神操或避靜。例如 2007 年寒假，在彰化靜山帶領烏蘇拉會修女八天的退省；給高雄道明會神父帶五天避靜等。

後記

少壯時未多想老年晚景，現在步入 90 高齡，必須面對這一事實了，也就是對過去的生活做一回顧。在口述歷史《志在榮主》中，我曾經描述過：

「我是在一群女性的愛護下成熟長大的，一路走來，直到 80 多歲高齡。從母親，到同輩，到晚輩，她們有如天主慈愛的手，陪伴我走過這一長程旅途。這使我想起一生陪伴主耶穌的母親聖母瑪利亞，我們無法想像一個沒有瑪利亞的耶穌。我們作神父的和所有的神職人員，實在常該向慈親好母、聖母瑪利亞祈求說：司鐸之母，為我等祈！」

人生如白駒過隙：由安徽省貴池縣北門外祖母家後門第一次看到天主堂後，我和母親二人開始一同學天主教道理，一同領洗；不久我進入貴池小修院，讀完小學和中學，在宣城大修院讀完哲學；然後，1947 年被長上派到羅馬傳信大學繼續讀神哲學。四年後，於 1951 年夏，赴西班牙入耶穌會、晉鐸，再回羅馬專攻聖經；最後，回到菲律賓、台灣執教至今。想做基督第二，這麼多年後，結果如何？

首先，是無盡的感恩，上主賞賜給我的遠遠超過我所想望的。其次，想借用羅光總主教刻在他墓園的一句聖詠展望未來：

「我要永遠歌頌上主的仁慈！」(Miseridordiam Domini in aeternum cantabo!)。做基督第二，是今世，也是來生；是我人，也是天主聖三；是短暫的幾十年歲月，也是無窮無盡的永生。是的，「基督第二」，是我一生所想望、所追求的理想，到了九十歲，還是

我夢寐以求的目標。信德指點我們說：信靠上主，全心依賴他的人，不會落空，信哉！

附錄：金魯賢《回憶錄》上卷（1916~82）讀後感

讀過並介紹過金魯賢主教的《牧函集》（2012 出版），今再介紹他的《回憶錄》上卷（1916~82）。這本回憶錄是金主教自己寄到台灣來贈送給我的，書首他寫著「敬請房志榮神父雅正。+ 金魯賢 2009. 6. 29」。訖此的《牧函集》是以名片「金魯賢致意」寄來的，《回憶錄》卻是他親筆寫上獻詞郵寄過來，令筆者深感榮幸，並佩服金主教做人的周到。全書 266 頁，共分五章：一、家庭；二、棄家修道；三、留學生涯；四、回國；五、獄中生活；其中以第五章最具特色：第一看守所（1955~60），公審、判刑（1960），上海監獄（1960~62），撫順戰犯管理所（1967~73），重返秦城（河北正定）、恢復翻譯組（1973~75），河南勞改第四大隊（1975~79），文化大革命結束（1976~79），河北第一監獄（1979~82），有朋自遠方來，回申歷程。

本書序言第二段，作者肯定說「我深深體會，人生會絕處逢生」。然後金主教寫了一段話，揭示出教會聖師們的境界：

「出生於公教家庭，受教育於公教學校，以後加入耶穌會，天主聖神用聖經上的警句指導我，沒有讓我墮落。屢遭變故時，我想到的是『虛而又虛，萬事皆虛』（訓一2）。在耶穌會初學時，由於初學神師的行為，我很苦悶，當時我記住了《師主篇》的教導 *Ama nesciri et pro nihilo reputari* 以被人輕視、被人遺忘為樂。在監獄裡，失去自由，想到

福女聖三依撒伯爾著作中的一句話：『天堂是聖三，聖三在我心中，我就像在天堂一般。』我就以監獄作天堂，內心不斷歌頌天主聖三，忘去了一切痛苦，其樂融融。』

序言結尾較長的一段是：「既深信世事全是空虛，為何還要寫什麼回憶錄？近日國外寫我的文章不少，流傳頗廣，其內容大抵與事實不符，有些內容是胡編的，也有故意誹謗的，對我無所謂，對中國教會卻產生了負面的影響，不利於我們的神聖事業，若我不澄清，外界人士將認其為真實。幾番內心鬥爭之後，決定寫下這回憶錄，讓讀者對這段歷史有所瞭解。」

序言結束的兩小段是：「我 1955 年 9 月 8 日被捕時，上海公安局把我所有的東西，包括我的日記、信件、所有的照片及生活用品全部抄走，什麼也沒有留下」；「釋放回申，心有餘悸，不再寫日記，不再保留信件，寫這回憶錄全憑記憶，必有錯誤，尚希諒解，並請指出。」（金魯賢 2008 年 8 月 30 日入耶穌會 70 週年日）。

序言最後引了兩句話：「為敬愛上主的人，一切都協成美好」（參：羅八 28）及「上主，你上智的安排永不會錯」（常年期第九主日集禱經）。本書的特色是清晰、親切、情深意竇，筆者尤其感受深切。1947~51 年間，我在羅馬傳信大學就讀時，首次遇到在額我略大學讀書的金神父；之後他當了上海主教，我也曾前去拜訪過他，對他為上海教區及中國教會所作的貢獻深感欽佩。他生於 1916；2013 年 4 月 27 日蒙主召回，求主賞賜他永遠的安息，與天朝神聖為我們轉禱！